

July 2012

Experience and History: Hoggart's *The Uses of Literacy*

Xiangyu Ch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g, Xiangyu. 2012. "Experience and History: Hoggart's *The Uses of Literac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4): pp.138-14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4/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经验与历史

——论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

程祥钰

摘要: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既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新左派文化论争的滥觞之作。在后世的争论中,关于霍加特本人和这部作品是否属于“文化利维斯主义”,以及其在战后英国左翼开创的一系列议题中的位置,一直是倍受关注的焦点,但这本书真正面对的特殊的历史情境及其意义却没有被广泛重视,因而往往导致相关评论陷入非此即彼的循环。本文试图综合现有的重要研究资料,对《识字的用途》加以历史性的理解,揭示其中的历史特殊性和这种特殊性对作者与作品的深远影响,从而以更为开放的角度来理解霍加特的局限性与开创性。

关键词:霍加特 识字的用途 工人阶级文化 大众消费文化

作者简介:程祥钰,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电子邮箱:chengxy1982@163.com

Title: Experience and History: Hoggart's *The Uses of Literacy*

Abstract: Richard Hoggart's *The Uses of Literacy* is generally taken to be an initiation of Engl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it also became one of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e “cultural controversy” emerged from the “first” New Left. The focal issues include whether Hoggart and this work fall under Leavisism, and what historical situation his work was born, but the historical specificities and implications have not been given due examination so that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Hoggart has fallen into an either-or cycle. The paper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Hoggart's *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reveals the historical specificitie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work and its author so that it may illumin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Hoggart's limitations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cul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 mass consumptive culture

Author: Cheng Xiangyu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Tsinghua University, with a research interest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chengxy1982@163.com

在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当中,横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文化论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场论战由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长期革命》、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围绕它们的讨论首先引发,并在英国新左派内部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自始至终充满着内在异质性的激烈争论。在这些争论声中,最早面世的《识字的用途》被认为处处可见文化保守主义者利维斯的影子,是利维斯主义影响下的左翼产物,因而作者霍加特也常常被冠以“左派利维斯主义”的名号。毋庸讳言,当时的霍加特无论在理论资源还是在分析方法上都深受利维斯的影响,然而简单地以“旧习难改”来看待《识字的用途》却是远远不够的。同样被视作“左派利维斯主义者”的威廉斯曾说“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本完全不同的书。《文化与社会》也许充当了从一个时代通往另

一个时代的桥梁,但是现在人们忽略了它只是一个桥梁”(93-94)。这番话提示我们,对《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这样“生逢其时”的作品,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用一些后来归纳出的问题框架来加以度量,而应该更加注重“时代的差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代的需求的差异”。对于1956年以后接连受到来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系列事件冲击的英国左翼而言,《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带出的一连串讨论,刚好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对于霍加特和威廉斯而言,他们在书中真正应对的却是二战前后直到五十年代中期的英国社会。因此,值得关注的首先是推动《识字的用途》诞生的内部与外部动力,是其意图与之对话和抗争的对象,以及这种独特的关注如何能够成为被新左派所共享的一个主题;其次是所谓的“利维斯主义”如何与激进的左翼思想获得了共同的关注,而这种交汇碰撞又有着哪些形式的

争夺与取舍,它们又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断裂的文本

在英国,关于文化的讨论显然要远远早于新左派的关注。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主义》到艾略特的《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再到利维斯等人的著述,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内部形成了一条逐渐明晰的“文化的观念”(威廉斯 79)。反过来也不难发现,文化几乎从来都是保守主义思想谱系中的重要一环,是思想精英们用来或反对或欢庆现代文明的重要武器。这样一部关于文化的观念史显然与霍加特等人的左翼的政治立场相冲突,后者想要谈论文化而又不陷于保守主义的问题框架之中,则必须重新选定讨论的方向与重点。在当时,霍加特首先面对的两个问题是“谁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与整体世界的关系”。

出身于工人家庭并且长期从事成人教育的霍加特,对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对于抽象地讨论文化明显没有任何兴趣。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为自己设立的讨论对象非常简洁明了——工人阶级的文化。与知识精英们谈论文化时动辄便联系到“传统”、“道德”、“民族”乃至种种自然法则与神圣律令的抽象化叙述完全不同,霍加特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阐释紧贴着工人阶级所生活的经验世界,他称之为“人民的‘真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真实”不再是柏拉图以来长期统治着西方观念世界的“抽象本质”,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生活中的经历,是这种丰富而且绵延不绝的生活经历所展现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而他笔下的“文化”则是在这一“自下而上”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传统。显然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与精英们打造的传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但霍加特并不急于在这种对立关系中展开论述。相反,他往往会从两种文化的交集处发掘出工人阶级文化对对手的各种堂皇说教的颠覆性使用和创造性转化。例如“宗教”:

随便找几个工人问问他们如何理解宗教,他们很可能非常简单地,但并非毫无意义地给出下面这些答案中的一个:

“做好事”,
“起码的礼貌”,
“救助瘸腿的小狗”,
“待人和善”,
“像你期望受到的对待那样去对待别人”,
“我们应当帮助其他人”,
“帮助你的邻居”,
“从错误中学到正确的东西”,
“过得体的生活”。

这就是家长们长久以来一直给孩子报名参加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的主要原因。次要原因我们也不陌生:父母们期望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宁静的周日下午,有时候他们会用命令孩子在课后到下午茶的时间里出去跑步的方法来延长这份宁静时光;或者妈妈已经辛勤地做了一上午的饭并已筋疲力尽;又或者爸爸想在看过了周日报纸之后小打个盹。不过所有这些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即主日学校能提供一种熏陶,避免孩子“走上歪路”。(Hoggart 84)

在霍加特的笔下,宗教这类原本浸透着上层权力精英的意识形态内涵的事物,在工人阶级群体中被出人意料地改造了。最初的基于经典与权威阐释的宗教道义遭到了瓦解,原先的神秘与神圣的特质被鲜明的世俗情感所取代。工人阶级用朴素的“善”取代了繁琐晦涩的教义,而这个“善”的定义权,显然也不是在权力精英的手中,而是在通过家庭、社区、工厂、地域等单位建立起广泛的共通的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手中。同样地,宗教原本的说教与归化功能被篡改。表面上看,工人家庭为子女报名参加专事布道归化的主日学校的热情始终高涨,仿佛是宗教的“道德感化”的胜利;然而霍加特幽默地告诉我们,其实这不过是家长们顺势推舟的小伎俩罢了,是工人们“神圣教化”的“日常使用”而已。

另一个例证出现在同样一向被权力精英把持的文化的精髓之一“艺术”方面。霍加特不仅大张旗鼓地提出了“工人阶级的艺术”这一概念,而且赋予它与任何“经典艺术”都截然不同的意义与特征:工人阶级的艺术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细微之处的至高无上的兴趣”,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展示”而非“揭示”,因此它不去理会抽象的本质理念或“超级真实”,而是将生活世界中的存在直接视作真实,将意义直接赋予生活本身,将贴近生活的细节作为接近这种真实和这种意义的有效途径。而在摆脱了本质主义的美学观念的同时,工人阶级的艺术也能够避开形式主义的陷阱:它虽然抵抗那些“崇高的理念”,但却不服膺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法则,而是“依靠一些简单但却稳固的道德规范来加以巩固”(Hoggart 86)。

霍加特还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朴素的阶级情感与道德观念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信心。他指出,各种群体往往会通过排他性来获得自我认同的力量,最直白的方法就是划分“他们”和“我们”。在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中,“他们”的世界是属于老板们和为这些老板们服务的公职人员的世界(Hoggart 48)。看起来这会是一个排他性极其强烈的自我意识,但霍加特同时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情感不会被这种社会成分的划分完全束缚。他以全科医生为例说道:“如果他通过专注于治病救人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那么,虽然他和他的妻子在社会存在的意义上属于‘他们’,但作为一位全科医生,他则不属于‘他们’”(Hoggart 48)。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工

人阶级对“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并不严格依照某些教条,而是更多地采取经验式的判断。这一点在后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僵化阶级论的新左派读来,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叙述不仅包括了宗教、艺术、道德情感这些文化的传统观念中的常见领域,同时还包括了许多“生活的细节”,如“习语”、“报纸”、“广播”、“邻里”等等工人家庭和工人社区中常见的生活形态。将这些一向被视为“不够高雅”的生活形态纳入到文化的考察范围当中,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而霍加特独具开创性的主张更体现在,他将它们阐释为一种不逊于其他文化形式的有价值的存在,并且是和上述那些已被“工人阶级化”了的大的概念范畴一起成为了支撑英国工人阶级连接过往、当下和未来,以及不断争取政治前途的内在动力。

然而,这种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充满信心的叙述只是《识字的用途》一书的前半部分内容,书的后半部分进入到了完全不同的语境当中。一个或许还并非众人皆知的事实是,《识字的用途》的“最初计划是分析大众出版的各种新形式,而它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激进革新——即试图在一种对其读者及受众文化的深度‘阅读’中将之语境化——只是后来才加入的”(霍尔 38)。换句话说,霍加特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传统所采取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与第二部分,即当下的工人阶级文化境况进行今昔对比的目的。与霍加特共事多年的斯图亚特·霍尔对《识字的用途》的根本用意做出了如下概括:“该书试图对以下问题提供一个综合性答案:大众报纸杂志与它们重点针对的工人阶级读者的各种态度之间是什么关系?更为紧迫的是,新兴而又更受商业驱动的大众交往形式正如何改变着旧的工人阶级态度及其价值观;简而言之,这种新的‘识字能力’是在被用于什么‘用途’?”(38)。作为半个世纪之后的回顾,霍尔的概括有意保持了一种较为中立、客观的语调,其目的是将霍加特在此开启的问题意识与后来几十年的英国文化研究工作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身处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的霍加特其实很难完全保持一种冷静、中立的态度。关于新兴的大众传播方式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影响,当时的霍加特整体上持负面的评价。^①最能体现这种倾向性态度的是霍加特为 *The Uses of Literacy* (《识字的用途》) 最初拟定的书名 *The Abuses of Literacy* (《识字的滥用》)。

霍加特做出这种评判并非完全来自关于传播媒介、受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后来成为英国文化研究核心议题的主题在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的讨论;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来自二战结束后十余年间的英国社会现实,来自于执政当局令人失望的决策和左翼群体面临的内外交迫的窘困。而对于霍加特来说,更直接的

危机感和挫败感来自英国工人阶级处境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在他所珍视的工人阶级文化上的反映。所谓的“改变”其实就是自工党战后执政以来便开始推行的“福利国家”制度。这种福利化制度并没有改变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但却能通过提供一定幅度的经济与政策资助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平衡。弗兰西斯·马尔赫恩曾揭示这种福利体系的两种危险作用:一方面消解激进政治的力量,另一方面美化保守乃至反动的政治策略(472)。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表面上的提高,其实仅仅是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消费能力的提高,乘势而起的则是消费社会和大众消费文化。消费社会的“丰盛”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和阶级意识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将消费社会自命的正当性提炼为“增长的神话”,而其逻辑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句话“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25)。它对个体的影响则是制造出这样一种观念“哪怕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从生产的加速增长中所获得的益处,也远远胜于任何一种形式的再分配”(26)。因此,消费社会的兴盛和福利待遇的提高,在当时带来的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退化和对现实政治的迟钝,其表现正如《识字的用途》的开篇第一句话“人们常说,现在的英国没有工人阶级,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已经发生了,它大大减少了社会差异,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栖居于一种几乎平坦的平原中,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到中产阶级的平原”(Hoggart 1)。这是一个“糖衣裹着的世界”(德沃金 134),在这个世界上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正在消融。

上述历史现实反映在霍加特的思考中,就成为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堕落”。这种堕落表现为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逐步丧失,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和消费文化所导致的阅读、思考乃至整体生活方式的“庸俗化”、“个人化”与“碎片化”。霍加特明确地将传统的与新兴的这两类事物分别称为“旧的秩序”和“新的转向”。这种区分基于他的一个判断,或曰假定,即早期阶段在出版物和其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紧密的、相互促进的联系,而在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的新形式之间,这种关系不再存在了。正是在这种有待商榷的新旧对比中,霍加特表达了他对“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形式对工人阶级传统精神气质的影响”(马尔赫恩 475)的担忧。霍加特的这种处理方式带来了很多问题,霍尔就专门指出,虽然霍加特在书的后半部分中明确提出过他的方法是“描述普通工人阶级生活的性质,以便对出版物更为仔细的分析可以置于现实语境之中”(39),但《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并没有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努力。某些潜在且先行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此时的霍加特,使得他在讨论“文化的滥用”时,未能完全践行紧贴经验的方法和语境化理解新兴大众传媒的方向,由此造成的

后果则是“导致《识字的用途》前后两部分显然不同的两种表述之间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张力”(霍尔 39,“号称是工人阶级生活两个时期的比较分析,但第一部分是半自传式的民族志学,第二部分则大部分是大众文化文本的批判性阅读,这两部分没有对比”(德沃金 118)。

二、“新”与“旧”的对立：“利维斯主义”的影响与转化

这种内在断裂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些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例如美国学者安德鲁·戈德温概括的霍加特的“反美主义”态度,即用“美国的”或“美国化”等字眼来指称、概括他所批判的大众消费文化中的危险、堕落本质。戈德温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做法既是‘真实的’又是‘意识形态的’”(Goodwin 24)。的确,霍加特用“美国”和“美国的”来指称导致工人阶级堕落的新兴大众消费文化,的确是带有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美国的消费文化生产方式不同于英国,也不能被直接视为新兴模式的“代表”,美国的文化商品在当时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渗透也远远没有达到后来的那种程度,因此用“美国特质”来概括“新的转向”并不妥当,这一点对于注重经验研究的霍加特而言是不能回避的;然而另一个同样不能回避的因素就是战后英国的复杂形势,对左翼而言,即是马歇尔计划和它附带的经济、政治、军事效应——凯恩斯主义、西方阵营、福利—消费社会,以及它们的示范效果——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阴霾。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霍加特的这种略显草率的概括其实是一种超越了具体论述对象的,对整体情境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应。那种随着社会福利化的提高迅速得到普及,渗透到普通民众生活的每个角落的大众消费文化,显然与马歇尔计划以及一同甚至更早进入英国的美国消费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中,这种联系更是会被特别地强调。

如果说时代的因素促使霍加特借用了一种本土与外来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话,那么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本土与外来的二元模式其实是另一种更为根本,也被贯彻得更为彻底的二元模式的变体,后者正是传统与当下,或曰旧与新的二元对立,是这一模式最为根本地导致了《识字的用途》的内在断裂。几乎任何研究者都会很快指出,传统/当下的二元模式是文化精英主义——以当时具体而言是利维斯主义——的标志。对传统的赞誉和对当下的抨击,这是利维斯及其《细察》团体的一贯风格,而现在看来霍加特也是如此。事实上霍加特本人也从不掩饰《识字的用途》和他自己受到的来自利维斯夫妇和“细察”风格的影响。^②在《识字的用途》中他曾说过“我并不认为在上一代的英国有过一种‘属于人民’的城市文化……但曾经至少部分意义上是‘属于人民’的大众文化的那些残

余也正在被破坏;并且,新的大众文化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不如它正在取代的那种不事雕琢的文化来得健康”(Hoggart 9-10)。正如霍尔所提示的,“健康”这个表示“诊断”的术语很好地提醒了我们某种影响的存在,这些影响来自于F. R. 利维斯本人的文化立场,Q. D. 利维斯的《小说与阅读的公众》中关于“衰落”的述说,《细察》的教育方案,丹尼斯·汤普森等人对低劣的广告语言的批判,也来自于他所引用的一批英美保守派批评家和作家的著作:所有这些都赋予了文化衰落——“病”的隐喻对象——以权威性(霍尔 40-41)。

霍加特与利维斯主义的这种亲近关系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对于英国文学专业出身的他而言,利维斯的风格与方法的影响在当时不仅具有“笼罩性”,而且表现出相对的“合理性”。直到2004年为I. A. 瑞恰慈的《实用批评》新版作序时,霍加特依然明确表示自己深受利维斯夫妇、“细察”团体、丹尼斯·汤普森和瑞恰慈等人的影响,并指出“在一个逐渐商业化,但却没有为应当说正在形成中的而非已然建立的民主所必须的那种‘判断’做充分动员的社会里,瑞恰慈将改革的工具传递给我们”(Hoggart 13-14)。霍加特借此表达出一种超越方法意义的对实用批评的赞赏,这一观点在威廉斯那里同样也得到过验证,因为利维斯等人在当时展现出的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的姿态,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在无意恪守教条门规的左翼群体当中引发了巨大的共鸣。马尔赫恩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随着教育中阶级特权的减弱,《细察》坚持职业要向有才之士开放的主张开始获得了一些认可。同时,听到利维斯学派的声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从两次大战期间的这些模式来看,教育界和传媒界中严肃文化的新风格,无论命名与否,在本质上都是普遍化的”(472)。这或许是一个被后来的批评者常常忽略或视而不见的“历史感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很可能会提供一种文化激进主义的方案,并且由此凝结一定的共识。

但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到无论是霍加特还是威廉斯,即使在其早期也都没有被利维斯学派完全占领。戈德温就指出“虽然《识字的用途》被描述为利维斯主义的(就其对大众社会的悲观态度和对‘有机的’文化构成之真实性的假设而言),但它在两个关键方面区别于后者。首先,霍加特发现了一种真实的感受和生活,它来自一个被利维斯所反对的工业化进程塑造出来的阶级。其次,霍加特反对简单假设新的文化工业对受众的影响”(Goodwin 17)。戈德温提供的是一个重要而又矛盾的观点。重要之处在于它揭示了霍加特与利维斯主义在立场、对象乃至方法细节上的深刻不同,而这种不同对于《识字的用途》的意义是决定性的;矛盾在于这种不同很难被清晰地证明,或者说,我们很难区分《识字的用途》中哪些是利维斯的影响,哪些是霍加特“经验式写作”的自

觉。但我们可以确信以下两点:一方面,霍加特对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想象性重建,其基石是“真实的感受和生活”,是诸如群体间的纽带、社会义务、家庭、邻居以及“我们”与“他们”之分别这类工人阶级生活中的“独特”的东西,它们不属于利维斯主义的文化批评的传统对象,也不是后者能够直接阐释的;相应的另一方面是,在这种特殊的重建过程中,利维斯主义的文化观念和批判方式必定会受到质疑和改写。正如德沃金所说,霍加特“承认工人阶级文化的局限性:俗气,对变化和革新的顽固抵抗,对新教的怀疑。但他坚持认为,仅仅是因为阶级偏见,使批评家误把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当成大众文化”(116)。其实对于精英式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怀疑态度,霍加特在《识字的目的》的第一页就已经表达出来“我倾向于认为,论述流行文化的著作经常会丧失它们的某种力量,因为它们没有充分弄明白何谓‘人民’,也因为它们将对‘人民的’生活的一些特殊方面的考察与人们更广泛的生活,以及人们对待娱乐的态度,不恰当地联系到一起”(Hoggart 1)。可见霍加特其实从一开始就有着警惕精英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的自觉。

然而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同文本内部存在着断裂一样,在他的分析对象和分析方法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断裂:一边是“有机的”、“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一边是鼓吹“有机”和“传统”,但却对工人阶级文化嗤之以鼻的大众文化批判。霍加特在方法上的选择,在当时其实也是“别无选择”,而由此带来的断裂,值得我们去做的已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的评判,而是对其产生的意义加以历史化的理解。霍尔就特别强调霍加特的文化观念的开创性,认为“它很不同于激励了文化批判传统的那种文化概念……这种关于文化作为‘使之有意义’的实践的看法确实与‘文化’作为评判的理想法庭的看法大相径庭,后者的标准是‘业已得到思考和诉说的最好东西’,也正是这个标准鼓舞了自阿诺德直至艾略特及利维斯的传统”(43)。虽然与马尔赫恩所说的利维斯主义的文化批判“元话语”依然纠缠难解,但霍加特将文化分析充分地语境化和细致化,从而使得无论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传统定义还是大众文化批评的传统方法都被深刻地改变。依靠“真实的感受和生活”——即所谓“经验”——霍加特得以避免传统的大众文化批评的许多自以为是的结论,从而确信“工人阶级受众并非中产阶级与大众媒介可以加以规划的空洞容器——一张白纸——无论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并不仅仅是‘虚假意识’或‘文化荼毒’的产物”(霍尔 42);同时,在这种开创性的研究过程中,霍加特一方面发展了《细察》的批判方法,将这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应用于活生生的经验,将生活经验作为文本加以阅读和分析,另一方面也同时拆除了精英式的和学院式的研究所设立的学科之间的界限,将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和政治批评有效地融合到了一起。^③虽然由于时代的压迫

感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经验化”、“语境化”和反对“简化论”等等诉求并未能始终贯穿《识字的目的》,但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对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以及英国新左派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霍尔赋予霍加特的这种“断裂”重要的历史意义,认为“对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形成时刻”(43)。

三、来自左翼的争议与问题的开启

除了这些积极的意义,霍加特所暴露的问题同样影响深远。这其中不仅包括与利维斯主义的缠绕关系,以及对“经验的真实性”的不加怀疑的确信,同样也包括了《识字的目的》出版后在新左派内部引发的许多批评性意见。威廉斯作为最早的批评者之一就曾经指出,霍加特过于强调了工人阶级文化与整体文化之间的隔阂,过分强调了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自足性而忽视了与其他的以及整体的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这种失误在书中的典型例子就是霍加特认为的“多数人”的“工人阶级文化”与“少数人”的“劳工运动”之间的对立(德沃金 134-35)。威廉斯认为霍加特将积极参与到公共政治事务当中的人视作顺从了“他们的”(主流的)文化与利益诉求的“少数人”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这个追求政治民主的运动中,“没有民众被吸引,而只有这个主流的加入。或许在这里,两种主要的文化观念——一方面是艺术、科学和知识,另一方面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在成熟的共同努力下,被有益地集中在一起了”(德沃金 135)。因此,过分强调不同阶级的文化与诉求之间的截然对立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借由这一批评,威廉斯充分表达了自己在《文化与社会》中通过“共同体”这一概念所确立的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与霍加特之间的差异。

另一位批评者汤普森同样也是在与自己观点的呼应中进行着对霍加特的批判式阅读。他对霍加特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霍加特虽然特别重视经验材料,但却对“工人阶级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更为全面的历史背景”(德沃金 138)缺乏充分和准确的了解,这导致他过分强调了二战之后工人阶级状况的转变,进而构成了他笔下新与旧的强烈对比。汤普森指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工人阶级已被社会地位的上升所引诱,以至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已是最初的消费者了,并且教会和国家力量争取同大众文化的主导者一样持久地控制人民意志”(德沃金 138)。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当下工人阶级正在遭遇着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灭顶之灾,更没有理由认为过去曾经有过田园牧歌般的美好时光。对手在变,诱惑与危险的源头在变,但诱惑、危险、压迫一直都存在,但也正因此,反抗与斗争同样一直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诱惑、压迫与反抗、斗争的关系当中,工人阶级才得以形成。汤普森很好地点出了霍加特不知不觉陷入的

一种倾向:虽然借助大量的经验材料和细部观察,但霍加特还是在工人阶级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的对比中赋予了前者某些先验本质的形态,用汤普森的原话来说,就是“主张文化现象的完全独立性,而不管阶级权利的背景”和“对不礼貌的历史学概念——阶级斗争的懦弱逃避”(德沃金 138)。这也导致了汤普森批评的第二个方面,也是上文中威廉斯提到过的,即对“劳工运动”等斗争活动的错误评判。汤普森高度评价这些斗争的历史意义,认为“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整个历史中,尤其是工会和劳工运动的激进活动分子,他们抵抗操纵和控制的形式,并转而为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而斗争”(德沃金 138)。由于工人阶级的本质并非一成不变的先验存在,因而就必须重视通过激发工人阶级的“创造性潜能”从而改变现实的力量。所以汤普森反对霍加特在“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中表现出的某种“反智主义”的倾向,认为应当正确看待劳工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因为“压迫当然是始终伴随着组织化的工人,但知识分子可以带给他们希望,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和潜在的生活方式”(德沃金 138-39)。因此,并不能因为有人采纳了“非工人阶级”的文化观念或政治路径,就将其归为“他们”或工人中的“少数”相反,带有绝对化和本质化倾向的“工人阶级的文化”与“非工人阶级的文化”这样的区分本身是存在问题的。由此可以想见,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中所说的“我们不能有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其存在各自独立,然后再把它们拉进彼此的关系中去”(1),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霍加特这一缺陷的批评。

威廉斯与汤普森的批评,除了指出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的过分排他性之外,实际上还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即霍加特对所谓“工人阶级文化”的过于整体划一的理解。德沃金认为《识字的用途》使“读者从知情人的角度获得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具体图景,这个知情人的广泛经历使他具有某种超然态度”,但另一方面,这个知情人的论述虽然“建立在孩童时记忆的基础上,但它也意指了整体的工人阶级”(118)。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不恰当的“超然态度”,是对自己的经验过于自信导致将其扩展为整个阶级群体的经验。从霍加特的行文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虽然是如此具体的经验描述,但在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更愿意使用“工人阶级”而非“工人们”或“工人群体”之类的称呼。德沃金尖锐地指出,霍加特“从来不考虑区域、种族和宗教上的差异造成的影响或英国社会变化的不均衡影响。他的经验方法比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要更有力,但是他没有把他的主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局限”(118)。事实上,这种局限不仅导致了霍加特将“旧”的工人阶级文化描述成铁板一块,而且也是造成他对新的大众媒介和新兴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文化之影响缺乏复杂性眼光的原因之一。正如德沃金例举的少年时期深受美国大众文化影响

的左翼建筑批评家雷勒·班纳姆所言“如果某人相信霍加特的思想,那么回想我成长所面对的文化背景,实际上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德沃金 119)。

无论如何,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提供了一份极为生动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整体经验记录,并且赋予英国工人阶级生活光明正大的文化身份,这对于当时正在紧张思考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自信心上的鼓励和方法视野上的开拓。在霍加特独自写作的时代,历史的契机尚未到来,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历史经验与当前现实的关系,工人阶级文化与整体文化的关系,新兴大众传播方式的复杂性等等,尚未得到充分而多样化的讨论。霍加特不仅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并且提供了重要的见解。面对美国消费文化的渗入和高福利所带来的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丧失,霍加特不自觉地,或者说是别无选择地拿起了利维斯主义批判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的武器,并且也使用诸如“庸俗”、“粗鄙化”、“堕落”等等精英主义者惯用的判词。这种基于紧迫感而展开的迅速反应,既问题丛生,又充满了创造力。他将利维斯式的经验细读和道德批判应用于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传媒的研究,既是方法上的奠基与开拓,又为后世进一步思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思想与激进主张之间的复杂关系架设了桥梁。不难发现,这些问题随着对《识字的用途》的批判性阅读,逐渐构成了英国新左派文化论争与文化研究的一系列主题。

注释[Notes]

①确切地说,虽然在后来长期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论争当中,霍加特也对新兴媒介以及当代文化有了更为复杂化的认识,但他的总体评价依然偏向于负面。参见 Hoggart, Richard. *Mass Media in A Mass Society: Myth and Reality*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第一章“Mass Society: An Outline”。

②霍加特在自传中就曾感谢过 Q. D. 利维斯的《小说与阅读的公众》,另外他的夫人奎妮·霍加特本人就是《细察》的一员,参见 Goodwin, Andrew. Introduction. *The Uses of Literacy*. By Richard Hoggart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8) pp. 16.

③参见 Goodwin, Andrew. Introduction. *The Uses of Literacy*. By Richard Hoggart.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8) 13-3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Baudrillard, Jean. *The Consumer Society*. Trans. Liu

- Chengfu and Quan Zhiga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年。
- [Dworkin, Dennis.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Trans. Li Fengda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Goodwin, Andrew. Introduction. *The Uses of Literacy*. By Richard Hoggart.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8.
- 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张亮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
- [Hall, Stuart.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 *British New Left Thinkers*. Ed. Zhang Lia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Hoggart, Richard.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8.
- .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action Edition. *Pract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 By I. A. Richard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 弗兰西斯·马尔赫恩“一种福利文化?——50年代的霍加特与威廉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 [Mulhern, Francis. “A Welfare Culture?: Hoggart and Williams in 50s”,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Vol. 3.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年。
-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rans. Qian Chengdan, et al.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01.]
-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
- [Williams, Raymond. *Politics and Letters*. Trans. Fan Ke and Wang Weifen.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责任编辑:王嘉军)

